ChinaXiv合作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
第64卷 第23期 2020年12月

蓝皮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 张雅琪　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目的/意义] 蓝皮书自清末引入中国，历经100多年已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蓝皮书形式。本研究旨在全面展现中国蓝皮书的发展演变以及影响其变化的各项因素。[方法/过程] 根据中国蓝皮书的发展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引入时期（1985年之前）；产生时期（1985年至1999年）；繁荣时期（2000年以后），并对这三个阶段中蓝皮书的形态变化和主题领域等情况进行简要概述和相关数据可视化呈现。[结果/结论] "蓝皮书"一词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如今，蓝皮书已由欧美的官方文件转变为中国的研究报告。中国的蓝皮书出版根植于整个社会体系，用以记录、分析和预测多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影响蓝皮书在中国发展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条件、出版机构、历史性的选择和惯例。

关键词：蓝皮书　出版物　研究报告　中国
分类号：G255　G256.1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23.001

蓝皮书作为一种文献类型，不同于其他以内容特征来命名的文献，其特殊之处在于"蓝皮书"之名得自其蓝色封面。从其命名的角度来看，蓝皮书的内容、格式、用途、功能等方面都是不明确的。事实上，从蓝皮书产生之日起，它似乎就在不同国家和时代"自由发展"，以致出现了不同内容、格式、用途、功能，但都统一被称之为"蓝皮书"的现象，这也使得蓝皮书这一类型更加难以被识别。当前有关蓝皮书的论述多集中于这类文献的基本状况[1]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2-3]等方面，这些分析和介绍通常限于特定蓝皮书系列或特定出版社范围，缺少对蓝皮书整体以及对中国蓝皮书发展历史的系统梳理。

蓝皮书目前在中国被当作是"学术出版物"[4]"智库产品"[5]"研究报告"[6]。大多数蓝皮书已成为承载高校、科研机构、智库、协会、学会等机构产出的记录国家和社会发展趋势和状况的主要载体。而且，蓝皮书市场还在逐年增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出版社加入到蓝皮书创作出版这一浪潮中来。但实际上，蓝皮书在欧洲是作为官方文件而诞生的，中国蓝皮书是区别于欧美蓝皮书的独特存在，而且，蓝皮书在中国也历经了多个时期最终形成如今的形态。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研读和统计数据展现中国蓝皮书从出现到实现自我发展的历史面貌，探讨并总结影响其发展重塑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填补我国蓝皮书研究领域的空白，另一方面，从时间的纵向角度探寻为何我国蓝皮书并未发展成为官方文件的原始形态，而是转变成为类似研究报告和发展报告的形态。我国蓝皮书之所以成为如今的"蓝皮书"，既是历史的选择，又是我国发展需求所推动的。

1　相关概念

蓝皮书（blue book）是一种"外来"文献类型，最早出现于欧洲国家。由于功能、用途、出版形式和汇编形式的不一致，"蓝皮书"一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OED）[7]仅指出蓝皮书的代表性形态，"由蓝色封皮装订而成的书，主要是英国议会和枢密院的官方报告之一，以及包含在美国政府任职的官员的书籍"。根据维基百科（2018年），蓝皮书是某种专业出版物而非连续出版物，例如公司信息指南（如，建筑与施工蓝皮书）、标准（如，CD标准）、规范（如，Java虚拟机）、照片书籍（如，纽约州收养主题照片服务）等。

蓝皮书以不同的形式用于不同的目的，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存在某种使用惯例。最常提到的可能是延续蓝皮书起源的官方文件。根据OED，"蓝皮书"一词可

作者简介：张雅琪（ORCID：0000-0002-7825-0830），博士研究生，E-mail：zyqjasper@163.com；柯平（ORCID：0000-0003-4038-6377），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20-06-01　修回日期：2020-07-22　本文起止页码：3-11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英国议会开始大量保存由蓝色天鹅绒覆盖的记录，最早出现于1633年，在1715年将这样的书籍称为蓝皮书。从那时起，蓝皮书被用来描述多种形式的政府手册、声明、报告等官方文件。例如，英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蓝皮书》[8]记录并描述了英国的经济活动，是关注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数据来源。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蓝皮书》被认为是西弗吉尼亚州各级政府的综合记录，自1916年以来每年由州参议院发布；《威斯康星州蓝皮书》作为年鉴，其中包含有关威斯康星州政府和公民的最为全面的信息资源。

蓝皮书的类似出版物包括红皮书、绿皮书、白皮书等。一种说法是这些出版物都是国家正式文件，但由于国外各国采用了不同颜色作为文件封皮，因此才形成了"蓝皮书""白皮书""绿皮书"这些概念。庐震京[9]认为"英国国会各种公布文件之总称也以表皮常蓝色，故名。实则亦有用褐色白色者。各国国家正式文件之公布者，多有一定之颜色，以为识别。"另一种说法是它们依据不同颜色封面而有所区别，A. Bullock和O. Stallybrass[10]认为蓝皮书应该与其他被称为白皮书和绿皮书的文书区别开来，前者包含政府政策声明，可能包括政府意图的公告和未来立法的建议，而绿皮书则被政府作为公开辩论和讨论的想法和信息。在中国，白皮书被作为政府官方文件，除白皮书之外的其他类型如蓝皮书则发展成为类似研究报告和发展报告等形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这些出版物视为一个整体并统称为"皮书"。苏新春和刘锐[1]认为将这些出版物联合起来的原因在于，随着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团体和单位数量的增加，书籍颜色的使用随着这些组织各自的理解自由命名，这使得这些出版物的边界逐渐模糊，颜色的区别便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也有种说法认为封皮颜色与主题内容之间的关系与其颜色寓意有关。例如，蓝色能代表学术的严谨慎重，因此蓝皮书通常代表研究团队或专业机构的观点；绿色意喻生命与未来，因此绿皮书多与环境、生态、旅游、农村等主题相关；黄色则意喻开放与包容，因此黄皮书多以国际区域性政治、经济等问题为主题[3]。

"蓝皮书"一词起源于官方文件，后来衍生出多种形式，表明蓝皮书一词没有明确定义，很难界定所有的蓝皮书。在实践中，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历史背景下的作者、出版发行机构、使用情况等，蓝皮书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如果将"蓝皮书"视为一种文献概念，那么它的身份通常是由外部力量促成的，这似乎表明"蓝皮书"具有各种可能性和发展潜力。没有这些前提，蓝皮书在中国的演化及其发展形式是难以理解的。

2 数据来源和分析

为获得我国蓝皮书从起源到当前的统计数据，笔者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在线公共访问目录(http://opac.nlc.cn)和超星发现数据库(http://www.chaoxing.com/)的在线学术数据库收集数据。笔者于2019年7月18日至20日使用检索词"蓝皮书"进行了数据库搜索。在国家图书馆中检索到1985年至2018年出版的5 978册蓝皮书，从数据集中排除翻译、缩微胶卷版本和海外蓝皮书，最终获得5 708册蓝皮书，同时，在超星发现中共检索到1984年以前的430份国外蓝皮书的译文和中文蓝皮书，从数据集中排除公告，共有374篇与本研究相关。此外，为了解蓝皮书与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笔者还整理并提取了各年度蓝皮书的主题词。为展现蓝皮书主要的关注对象，因此排除"研究报告""白皮书""调查报告""研究""分析"等描述蓝皮书本身特性的关键词。并且，统计用于主题领域分析的分类号，将蓝皮书的分类号进行计数并分组归入到相应的主题类别中，鉴于某些蓝皮书有2个或3个分类号，每本蓝皮书至少被归入到1个主题类别。

图1描绘了中国蓝皮书的发展趋势。外国蓝皮书的翻译版本于19世纪末在中国出现，1898年，《万国公报》刊登文章《中英交涉蓝皮书译要》《英议员会议蓝皮书》，这是查询到的出现于我国最早的蓝皮书。从1898年到1910年，总共出现365份蓝皮书译文，其中8份(2.2%)是翻译书籍，357份(97.8%)是在外交报纸、商业报纸等发表的文章，1904年达到这一阶段的峰值180余份。一些摘录自蓝皮书有关于外交、经济问题的翻译文章发表在《外交报》《商务报》等期刊报纸，其中，《外交报》刊登了数量最多的文章，共335份，涉及1901年到1910年间的政治问题。这段期间翻译文章和书籍的出现和增多可能是源于清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但是，在1912年之后的70多年间，蓝皮书的数量急剧下降，已几乎未能查询到相关记录，这一发现与1912年清朝灭亡时间基本一致，记录的中断可能是由于战争和社会混乱造成的。1985年出现了中国学者撰写的蓝皮书，从1985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蓝皮书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蓝皮书的数量略有增加，部分原因是政府部门和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蓝皮书，这一时期的许多蓝皮书是为内部交流或作为报告提交给政府的。增长率在20世纪初期趋于稳定，此后年均增长率

约为 23.1%，最近十年约为 16.7%，这表明增长率趋于稳定且市场正在增长，这一发现与全国皮书会议的兴起(2000 年)基本吻合。从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出版的蓝皮书数量均超过 600 册。这些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出版商、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为该领域做出了贡献。

根据蓝皮书查询记录，1985 发布的《中国技术政策:国家科委蓝皮书》系列是数据集中最早的现代意义的本土蓝皮书，即随后的蓝皮书基本延续了其研究性质。2000 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皮书会议，自此围绕蓝皮书等出版物有了全国范围的专家研讨。而且，从图 1 中也可看出，1985 年之后，蓝皮书的出版数量有所增加，进入 20 世纪之后增长幅度加快。因此，以 1985 和 2000 年为时间节点，将我国蓝皮书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引入时期(1985 年之前)；产生时期(1985－1999 年)；繁荣时期(2000 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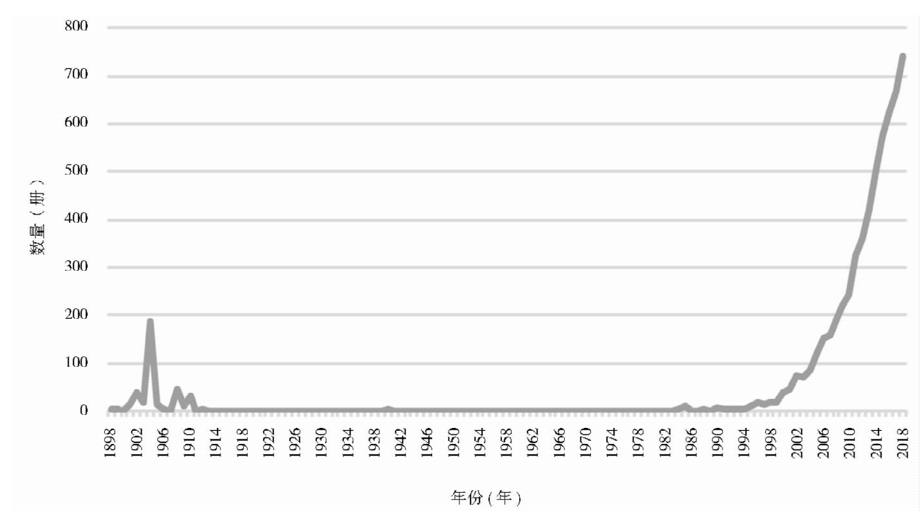


图 1　蓝皮书数量变化趋势（1898－2018）

3　中国蓝皮书发展阶段

3.1　第一阶段:引入时期(1985 年之前)

早期出现于中国的“蓝皮书”并非国内学者的专门著作，而是国外蓝皮书的译著。在清朝动荡年代，国人开展洋务运动，期望通过译介西书达到启发民智和救亡图存的目的。在迫切需要了解并研究世界情况的背景下，英国“蓝皮书”、法国“黄皮书”等一系列记录事实的官方文件成为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1901 年，清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进行改革并开展近十年的“宪法改革”。商务出版社(成立于 1897 年)于 1910 年收集了在此期间(1901－1911 年)颁布的法律和法令，按照类别重新整理并出版了《大清光绪新法令》和《大清宣统新法令》。《大清光绪新法令》规定“翻译各国外交成案如蓝皮书黄皮书之类”。目的是“各国政书如英蓝皮书、法黄皮书之类。各国交涉法门可为我则效者、可证我缺失者、可备我采择者、可备我辨论者”[11]。同时，规定了存放这些文件所在，“储才馆应备各种书籍报纸……各国大政书近十年以内者(如英国蓝皮书之类，以后随时增购下阅)”。

一系列西方蓝皮书成为清末官员和有关人士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国际关系的途径之一，有关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地方情况、国际关系等主题的蓝皮书被翻译成中文。例如，郑君、郑贞来、黄文浩等人对《英国蓝皮书》进行的翻译，依托湖北洋务译书局刊印，包括七册《英国蓝皮书》(1903 年出版)以及有关于江西省、云南省的考查记录或报告;《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1913 年出版);《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1984 年出版)等。此外，翻译文章还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外交报》(1902－1911 年)中，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以评述国际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报刊，蓝皮书译文以该报刊为主要阵地也正说明蓝皮书的政治属性。经统计，从 1898 年至 1984 年，共产出 304 份政治领域的蓝皮书译文，超过总量的 70%。

国内学者早期翻译国外蓝皮书的同时也引入了“蓝皮书”这一文献类型的思想，历时经年的翻译工作，使得国内学者对蓝皮书的认识逐渐加深，在 20 世纪中期，国内的一些小册子及工具书中出现了关于蓝皮书的术语概述，以及相关类型红皮书、绿皮书、白皮书等简要描述。例如《国民词典》(1941 年出版)介绍了英国议会蓝皮书。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以“提示图书馆所用之术语”的《图书学大辞典》(1971 年出版)

展示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蓝皮书的写作风格。这一记录表明，蓝皮书已被中国学者认为是图书馆学领域的相关术语。

由于严肃的政治形势，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期，翻译工作转向了另一种形式。蓝皮书以外国文学、政治、历史和哲学作品方面的翻译而存在。这些书的布局和封面设计都很简单，只有蓝色、灰色、白色、红色的封面，这些书籍因其样式也被称为蓝皮书、灰皮书、白皮书或红皮书。但是，此类书籍因其特殊目的，依据其封面上印有的“内部参考”或“内部发布”等字样而具有发行限制[12]。

3.2 第二阶段：产生时期（1985－1999 年）

尽管 20 世纪初已开始了英语或日语的国外蓝皮书的翻译工作，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才出版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蓝皮书。在历经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蓝皮书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蓝皮书多数始于政府倡议。经济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任务，而且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并且加快科学技术向经济的转化，政府机构召集、组织和授权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相关调查和论证，科研人员基于政府力量和权威开展相关调查和研究，组织撰写相关报告，如《中国技术政策：国家科委蓝皮书》和《经济蓝皮书》。从图 2 可以看出，蓝皮书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经统计，经济领域约有 80 册，政治领域 20 册、文化领域 14 册、社会科学领域 1 册。表 1 说明，蓝皮书已初步形成了“发展”“预测”和“趋势”这一基本结构，而且这种分析主要面向的是经济发展。此外，图 2 蓝皮书所呈现的波动性表明蓝皮书市场并不稳定，部分原因可能是蓝皮书发行限制所造成的，一些蓝皮书仅限于内部流通，因此，这一时期也是蓝皮书由非正式出版物向正式出版物转变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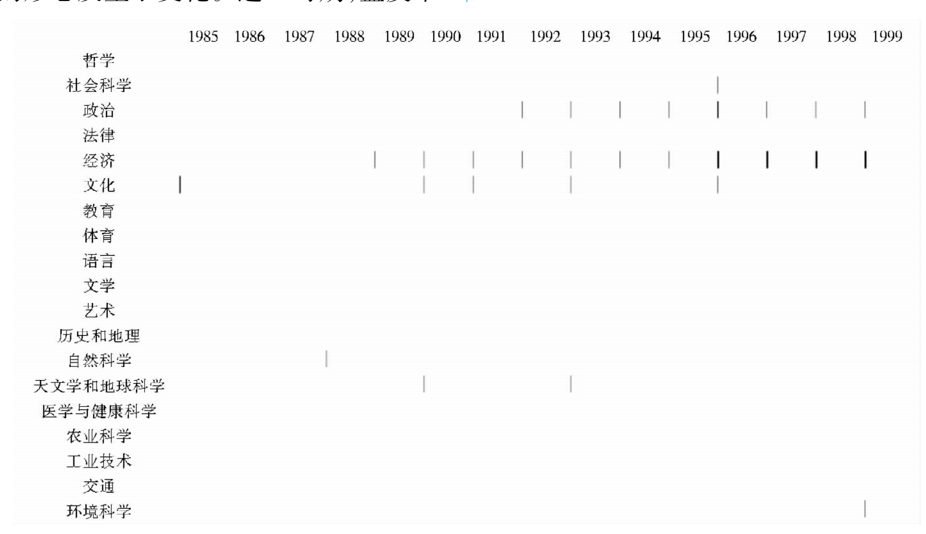


图 2 蓝皮书主题领域分布（1985－1999 年）

1985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针对专门领域技术政策的蓝皮书，即《中国技术政策：国家科委蓝皮书》。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自 1983 年 1 月起，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等机构联合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技术政策研究，包括交通、通讯、材料工业、机械工业、住宅建筑、建材、农业、消费品工业、集成电路、计算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的 2 000 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各专业领域专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将 13 项技术政策汇编为中国技术政策蓝皮书，最终形成 11 册。这套蓝皮书中既包含国家政策指导文件，涉及某一专业领域的国家政策、规划、重要决定、法律法规、正式文告等，又充分发挥专家论证的科学性，每册均包含制定技术政策所需的专家调查论证的支撑材料，为有关部门在研究和执行技术政策提供参考。之后，国家科委在 1988 年至 1993 年又组织编著出版了包括气候、知识产权、海洋等技术政策的蓝皮书，并分别加以编号，这一系列蓝皮书被称为“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在这种背景下，其他地方科技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部门也会同专家学者陆续发布了有关地方技术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的蓝皮书，对经济发展进行总结、分析和预测，并提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对策措施。另一个例子是 1990 年发布的《经济蓝皮书》。1990 年中央政府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座谈会。会后，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提交了《关于开展宏观经济预测情况的报告》，国务

表1　蓝皮书最常使用的主题词(前20名)
(1985－1999年)

主题词	标引次数
经济预测	48
经济发展趋势	21
经济	14
技术政策	11
社会发展	5
经济发展	5
社会	4
区域经济	4
科技政策	3
住宅建设	1
制度	1
知识产权	1
政治	1
信息技术	1
消费品工业	1
乡镇	1
文化事业	1
通信	1
社会主义	1
社会问题	1

院研究室要求积极实施这项工作。这产生了1990年12月第一次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根据预测的结果和座谈会的现场讨论成果形成了一本书用来分析和预测经济形势[13]。这本书当时并未正式出版，只是用蓝色封面包裹起来，因而被称为《经济蓝皮书》[14]。

这一时期，“蓝皮书”一词虽着重被官方层面启用，但科研人员逐渐从官方组织编纂工作的参与者转变成为商业蓝皮书编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并且商业出版社的参与对于蓝皮书出版周期和产出格式等方面都有所影响。而且，蓝皮书作为以年度为单位发布的形式已初见端倪。《经济蓝皮书》或许可以看作蓝皮书这种演变的一个缩影。虽然在编写《经济蓝皮书》的过程中，政府权威和学者担负的责任与《国家科委蓝皮书》《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相似，但前者在蓝皮书出版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自1992年《经济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以来，此后每年都会产出新的蓝皮书来预测经济状况。有学者认为这种以蓝皮书形式，请专家对我国下一年度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宏观预测的做法，将逐渐成为一项制度[15]。

3.3　第三阶段:繁荣时期(2000年以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涉足蓝皮书领域，蓝皮书出版数量不断增加(见图1)，然而书籍的质量问题也逐渐突出并引起了相关讨论。2000年，第一届全国“皮书”会议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这是第一次关于蓝皮书和类似书籍的专门会议。与会者认为，创作和出版蓝皮书和类似书籍要规范其形式和内容。该会议被认为推动了“皮书”发展成为用于呈现学术成果的概念，使其作为一种公众话语进入并影响社会发展[3]。此后该年会每年召开，时至今日已举办了二十次。

这一时期蓝皮书覆盖的领域得到极大扩展(见图3)，以各个产业、领域、学科、高校、机构等为主题的蓝皮书应运而生，涉及地理学、产业经济学、体育经济学、人文学科、医学、新闻学、海洋学、社会学、药理学等多个学科。经统计，这一时期蓝皮书在各领域的产出情况大致为:经济(3 256)、政治(985)、文化(785)、教育(222)、法律(175)、社会科学(174)、医学与健康科学(117)、环境科学(84)、工业技术(71)、艺术(53)、历史和地理(40)、体育(36)、交通(36)、文学(29)、天文学和地球科学(29)、哲学(18)、自然科学(8)、语言(4)、农业科学(4)。而且，以单个领域来看，蓝皮书都是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表明蓝皮书的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

社会性事务和问题仍然是蓝皮书的重要主题，大多数蓝皮书仍然集中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尤其是国家及地方各级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表2显示，相比发展阶段，蓝皮书除持续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之外，对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也颇为关注，包括互联网、教育事业、城市化、服务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等。一些机构热衷于社会热点问题，如跟踪和监控数字出版、智慧城市、微信、医药物流、全民阅读、人工智能等发展。城市建设和地方发展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目前，各省都已有相应的蓝皮书用于省级发展情况的年度总结和预测。

随着蓝皮书的内容逐渐覆盖社会各个领域，作者身份体现多元化，包括政府机关、学院、研究所、社会组织、公司、期刊编辑部、咨询公司、协会和学会等。一些机构和研究小组以合作的形式编制蓝皮书是最为常见的形式，而且，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在国际问题上的跨界合作也是大势所趋。其中，研究所是主要的产出者之一，延续了产生时期蓝皮书起源于研究人员的惯例。社会科学院是科研机构的典型代表，各地方的社会科学院针对地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促进地方发展。蓝皮书是表达这些研究成果和意见的工具，因此，作为知识服务和成果推广的蓝皮书被认为是是智库的产出成果[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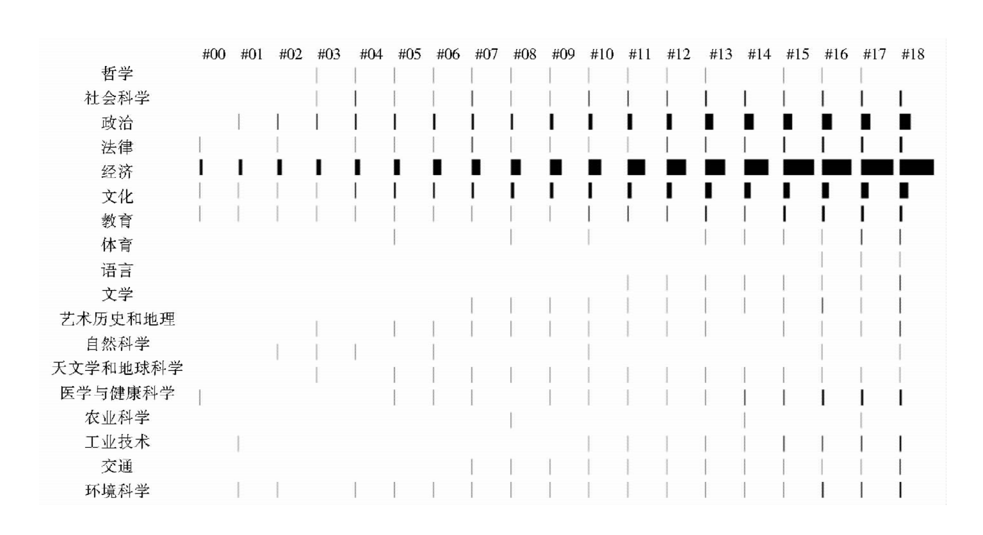


图 3 蓝皮书主题领域分布(2000 – 2018 年)

表 2 蓝皮书最常使用的主题词(前 40 名)(2000 – 2018 年)

主题词	标引次数	主题词	标引次数
经济发展	1 070	互联网络	50
社会发展	664	区域经济	49
区域经济发展	441	发展战略	45
经济预测	291	教育事业	45
产业发展	249	企业管理	43
文化事业	208	出版工作	42
社会调查	182	国际合作	42
文化产业	133	竞争力	41
经济发展趋势	128	人才培养	41
社会主义法制	114	社区建设	41
产业	87	体制改革	39
传播媒介	78	房地产业	36
城市	70	企业责任	36
经济分析	67	社会服务	36
文化发展	67	政治	36
城市建设	62	地方政府	34
工业发展	62	人才	34
服务业	57	金融事业	33
文化	52	城市经济	32
汽车工业	51	电影事业	32

4 蓝皮书发展的影响因素

4.1 政治意识形态

蓝皮书的演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反映当局的行政导向。自清末以来,蓝皮书在中国大致存在三种形式:外国蓝皮书的翻译;外国文学和其他作品的翻译;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论证。清政府将外国蓝皮书视为外交文本,将书籍存放在储才馆(外交人员培训机构)并进行翻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和出版制度,但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翻译和出版的内容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干预,导致文学标准很容易被政治标准所取代[16]。为了实现政治任务,使用蓝色封面用于装订文学和社会科学翻译,形成出于政治目的的所谓的"蓝皮书"。在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以科技手段促进经济发展"[17],科研人员地位增强和研究分析功能被着重强调,这为发挥科研人员在政府部门决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创造了条件,蓝皮书这一文献类型则成为了承载这些研究成果的载体,并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如《国家科委蓝皮书》。当前,多数蓝皮书延续了这种以科研人员为主体、科研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形态。

4.2 社会条件

蓝皮书作为因变量受制于社会各因素,而社会因素有时并不独立。在晚清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引发政策改变,进而影响了蓝皮书翻译工作,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共同对蓝皮书发挥作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当社会问题成为蓝皮书的研究对象时,社会因素对蓝皮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蓝皮书根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当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基本任务,蓝皮书便重点关注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随着社会进步和各领域、各行业的发展,新问题接踵而至,为探究和总结这些问题而

出版的蓝皮书也越来越多,始终延续着社会问题引导蓝皮书选题的趋势。从产生时期和繁荣时期蓝皮书主题词的统计分析也可发现蓝皮书主题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且,“发展”和“预测”皆是重要关键词,这表明蓝皮书对其对象的跟踪和监测的作用。

此外,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也在稳步增强,科研人员的大量参与赋予蓝皮书预测其对象发展情况的能力,各种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访谈、案例研究、数学模型等被纳入蓝皮书。徐明君和牟岱[18]认为,学术独立可能是将蓝皮书与白皮书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特征,蓝皮书应该反映独立的专家立场。这些结果表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蓝皮书提供了研究对象;科学研究和方法则是蓝皮书的内容支撑。

4.3 出版机构

蓝皮书与出版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出版政策的调整、出版结构的优化、图书质量的提高和出版制度的改革,大多数出版社转变为独立经营的企业[19]。通过改革体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动出版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20]。出版社的数量从 1985 年的 215 家[21]增加到 2018 年的 585 家[22]。出版社的数量和出版选择的自主性为更多主题多样的蓝皮书奠定了基础。据笔者统计,从 1985 年到 2018 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有 302 家出版社已出版发行蓝皮书,其中北京有 132 家出版社占据蓝皮书市场的 68.5%。科学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最早出版蓝皮书的出版社。当前,出版社和作者通过合作成为“联合创作者”,表明出版社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并且日趋重要[23]。伴随这一发展,一些出版社将蓝皮书作为其主要产品。其中,最主要的例子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出版社从 1996 年到 2019 年已经出版了超过 3 000 册蓝皮书,占将近一半的蓝皮书市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出版机构,社科院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专家学者资源。同时,通过与其他部委、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扩大了蓝皮书的研究领域。另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品牌,促进蓝皮书的研制和出版。

4.4 历史性选择和惯例

起源于欧洲作为官方文件的蓝皮书在当前中国以另一种形态不断发展,除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影响外,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或许也可用来解释这种发展。J. Mahoney[24]认为,“路径依赖”具体表征那些历史序列,在这些历史序列中,偶然事件在制度模式或事件链具有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发生的事件会产生持续影响的后果[25],并且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它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或者逆转的成本非常高[26]。

作为出版惯例的蓝皮书的兴起符合路径依赖的三个特征。首先,蓝皮书系统对在整个历史序列的早期阶段发生的事件(例如,书籍封面的选择)高度敏感。在提交国家经济报告之际,蓝色而非其他颜色被选为报告封面。《中国技术政策:国家科委蓝皮书》系列和《经济蓝皮书》对各利益主体随后的出版决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早期的利益集团以蓝色作为这种非官方文件的封面颜色,并且所有随后的蓝皮书延续了这一决定。

其次,建立轨迹的关键时刻[27],即蓝皮书制作过程,它以偶然事件(蓝色封面的初始选择)的组合为标志。以《经济蓝皮书》而言,正如陈泽伟[28]所言,蓝色封面是仿照国外发布文告的形式。但英国、意大利、日本的官方文件的封面颜色各不相同,所有这些颜色的封皮都应是当时的潜在选择。谢曙光和吴丹[3]认为颜色“蓝色”与学术严谨性有关。总之,这些不同的猜想表明,这一阶段的命名似乎并没有实际意义,即早期事件作为偶然事件,是无法根据先前事件进行解释的。

第三,一旦发生偶然的历史事件,蓝皮书的制作实践往往会与早期的特定结果保持一致。在自我强化的序列中,有一些机制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再现特定的制度模式,包括历史社会学家提出的功能、权力和合法机制。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一旦蓝皮书作为非官方形式出现在中国,自我强化的过程导致其迅速扩散,包括:出版物不断增多以占据图书市场;广泛的宣传和制定蓝皮书特有的规范。这些行为可以影响蓝皮书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及其后续行动,加强“蓝皮书”与某些内容的联系,并排除蓝皮书的其他用途。

然而,蓝皮书系统毕竟不是一个严格的“制度”,至少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变化的实体。该系统尚不稳定且网络结构松散,限制了路径依赖的适用性。尽管如此,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蓝皮书与英国和美国的蓝皮书存在如此显着的差异。这种解释或许可以推广到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来

解释其他形式的“蓝皮书”。

5 结论

蓝皮书在不同国家和时期拥有不同的内涵。通过对上述记录的调查表明，蓝皮书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首次在中国出版。这些政府委托的研究报告与晚清时期中国记载中提到的第一批“蓝皮书”截然不同。由此可见，对“蓝皮书”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晚清政府和官员赋予蓝皮书以外交文件标签并用作参考，但“蓝皮书”现在则更多的作为关注社会问题的资讯类出版物。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蓝皮书的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外国蓝皮书的翻译入手、作为政治工具、成为记录和预测国家发展的一种形式，表明蓝皮书随着社会条件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而变化，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也对蓝皮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历史性的选择和实践是“蓝皮书”成为如今的蓝皮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的蓝皮书根植于社会制度，符合新兴的社会发展需求。与在英国和美国以此名称发布的官方报告不同，中国的蓝皮书作为出版业的其中一部分，受到市场行为和研究实践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苏新春，刘锐. 皮书的语言使用与语言特色[J]. 语言文字应用，2015(3)：22－32.
[2] 万斌，杨建华. 中国皮书的发展及其意义——以《浙江蓝皮书》为个案[J]. 浙江学刊，2002(5)：68－73.
[3] 谢曙光，吴丹. 皮书与当代中国研究[J]. 出版广角，2016(13)：20－23.
[4] 邬书林. 立足创新、提升质量，建好出版平台传播好智库成果[M]//谢曙光，蔡继辉，吴丹. 皮书专业化二十年(1997－2017).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1－71.
[5] 谢曙光. 皮书研创与智库建设[M]//谢曙光，蔡继辉，吴丹. 皮书研创与智库建设.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2－44.
[6] 王振顶. 图书出版界新名词“皮书”[J]. 中国科技术语，2009，11(3)：58－59.
[7] SIMPSON JA，WEINER ESC.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 2nd ed，volume Ⅱ.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327.
[8]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ccounts [EB/OL]. [2020－05－29].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60105230758/http://www.ons.gov.uk/ons/rel/naa1-rd/united-kingdom-national-accounts/index.html.
[9] 庐震京. 图书学大辞典[M].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572.
[10] BULLOCK A，STALLYBRASS O.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M]. London：Fontana/Collins，1977：72.
[11] 端方. 大清光绪新法案(第三册)[M]. 上海：商务出版社，1910：22，149.
[12] 沈展云. 灰皮书，黄皮书[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序言.
[13] 皮书博物馆. 皮书的起源[EB/OL]. [2020－07－20]. https://www.ssap.com.cn/c/2017-07-30/1058911.shtml.
[14] 中国网. 社科文献出版社与荷兰 Brill 出版公司：中国皮书走向世界[EB/OL]. [2020－05－29]. http://www.china.com.cn/fangtan/zhuanti/zgcbr/2007-09/06/content_8827340.htm.
[15] 李雪季，金峰. 跨世纪领导干部工作宝典(中)[M].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39.
[16] 邹振环. 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317－318.
[17] 李鹏. 发挥科技优势 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 年 3 月 10 日)[J]. 陕西蚕业，1988(2)：1－4.
[18] 徐明君，牟岱. 编写机制与文化产业蓝皮书的原创性[J]. 编辑之友，2009(4)：28－30.
[19] 王曦. 改革开放 40 年的图书出版[J]. 科技与出版，2018(12)：13－24.
[20] 周蔚华.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 40 年：历程、主要任务和启示[J]. 出版发行研究，2018(8)：5－14.
[21]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中国出版年鉴 1986[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2] 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8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8－29(002).
[23] PINTER F. The academic ‘book’ of the future and its function [M]// LYONS RE，RAYNER SJ. The academic book of the future.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39－45.
[24] MAHONEY J.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J]. Theory and society，2000，29(4)：507－548.
[25] SEWELL WH. Three temporalities：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M]//MCDONALD T J.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245－280.
[26] LEVI M. A model，a method，and a map：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M]//LICHBACH M I，ZUCKERMAN A S. 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 2nd edi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9－41.
[27] PIERSON P. 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135.
[28] 陈泽伟. “皮书”卖点不在“皮”[M]//谢曙光，范广伟，蔡继辉. 皮书研究：理论与实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9－42.

作者贡献说明：
张雅琪：数据收集及整理，论文撰写及修改；
柯平：确定选题及后期论文修改指导。

张雅琪，柯平. 蓝皮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23):3-11.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Blue Book in China

Zhang Yaqi　Ke Ping
Business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lue books are followed from their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under the Qing government. Through a subsequent century of formal diversification and proliferation, blue books have developed into vers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report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blue book in China, and on the various factor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at evolution.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uggests a three-stage model of the blue book's history in China: Introduction (before 1985), Generation (from 1985 to 1999), and Proliferation (after 2000),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data visualization on form changes and subject-area distribution of the blue book in the three stages. [Result/conclusion] The term "blue book" has acquired somewhat different meaning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periods. Today, the blue book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n official document in a European/US setting into a research report in China. Blue book publishing in China is rooted in the social system at large to record,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developments of a number of areas. Contextu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blue book's development include: political ideology, social conditions, influence of publishing houses, historical choice and convention.

Keywords: blue book　publication　research report　China